

■新作聚焦

## 季栋梁长篇小说《上庄记》：

# 现实主义的冷峻与理想主义的温情

□赵 勇

季栋梁的《上庄记》原来是一部中篇小说(刊发于《山花》2011年第7期),发表后受到好评。之后,作者将其改写为近30万字的长篇作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成为长篇小说后,作品的内容果然丰满了许多,主题也不那么单一了。如果说原作的中篇小说反映的是乡村空巢后的教育问题,如今的长篇作品已大大越过了这一边界,成为中国偏远落后乡村世界的全景式写照。而且,它似乎也衔接上了中断多年的“问题小说”之线,赵树理式的隐忧与焦虑在小说中此起彼伏。

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作为下乡的扶贫干部,“我”一到上庄就被那里的贫困与破落惊呆了。学校里有40多个学生,却没有一个老师,扶贫干部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教师。一些孩子不断打工的父母进城,上庄的教育就更没人重视,已有名存实亡之虞。于是,老村长和“我”便里应外合,频频出招,试图从教育问题入手,由此扩而大之,进一步解决上庄的贫穷问题。然而,对于一个扶贫干部来说,他能使用的招数又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他从自己的那个文化单位要不来钱,便只好不断找关系、求老板,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解决问题。比如,“我”为了让盼香的两个儿子去省城读书,动用了省教育厅同学的关系。为了让村里的几个特困户脱贫,“我”又与人合伙给功老板“下套”,让老板把20多万元的红包送到了乡

下。这位扶贫干部下乡一年,最终似已成为解决问题的专家。

我们知道,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大都隐含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通常是通过上面的干预、政策的调整。只是这样一来,小说虽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其现实主义力度也有所减弱。许多年之后,季栋梁也通过小说解决起了问题,但他的解决方式却令人深思:表面上他是解决了问题,但同时,这种解决本身已让人感到辛酸和无奈。另一方面,这种解决方式又治标不治本,于是,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但背后却隐含着更严峻的问题——面对穷山恶水,面对由老弱病残苦苦支撑的村庄,如何才能让他们彻底走出贫困呢?村民希望所寄托者,是一个人脉广、关系多的扶贫干部,且这位干部恰恰又能被贫穷震撼出同情之心。倘若扶贫干部没什么能耐,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这便是这部小说的吊诡之处,而恰恰是这种吊诡显示出现实主义精神的某种力度。因为表面上看,作者已用种种“歪门邪道”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这似乎也是他提出更大问题的一种策略和技巧。我想,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无权无势的扶贫干部,当问题已远远超出他的解决能力时,他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除了这种现实主义的冷峻之外,我还在小说中看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温情。小说中有

一个细节:“我”当记者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一根烟》,那是在写另一个上庄的贫困。“我”进村之后,向村民一根根地散烟。在这些人中,有个名叫朱光耀的村民,他虽然接了烟,但却并不抽,而是架到自己的耳朵上。起初,“我”以为这是一位爱占便宜、怕吃亏的男人,后来才得知,原来老朱是位孝子,他拿这根烟是为了回去孝敬老娘。不管弄到什么东西,让老娘先尝已成为朱光耀的下意识行为。于是,“我”被震惊了。“我”的老板功全泰读了这篇文章,内心受到了感动,于是主动联系了这位扶贫干部。也正是这样,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给他“下套”,功老板也借坡下驴,主动“上套”。

我把这处细节看作一道理想主义的微光,它一方面依然让文学(《一根烟》那个真实朴素的故事)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老板的形象。在当今社会中,经过媒体渲染之后的有钱老板,要么是挥金如土、只知炫富的土豪,要么是腰缠万贯、没有文化的财主。“脑袋大,脖子粗,不是老板就是伙夫”似已成为他们的基本定位。然而,《上庄记》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读了文学作品还能热泪盈眶的老板,一个为了寻到作者打了58个电话的老板。现实中,这样的老板究竟占多大比例,无从统计,但小说中的这个功老板却有慈悲之心,尚慈善之道。他不但让“我”渡

## 从“游荡”到“游牧”

——关于陈超《诗野游牧》及其“现代诗话”

□霍俊明

在陈超看来,“新诗学”也是一场语言的实验。他几乎对每一个词语都经过了反复的斟酌、推敲和捶打、淬炼,而这一过程又非常可贵地在高度精准的同时维持了语言自身的趣味。在陈超这里,追求“母语的荣耀垂直阅读”不仅不是拒绝阅读的,更不是艰深晦涩、枯燥无味的。而这种话语方式在精神本源上与“诗话”传统一脉相承。当然,这也不意味着“诗话”就比其他批评方式要更高级和进步,而是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对批评家自身的要求更高。“诗话”的吉光片羽的闪现,确实能够支撑诗歌这种特殊文体的核心,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因话语“缩小”方式所带来的“整体性”架构的丧失和弱化。而陈超的“现代诗话”则一以贯之地深化了这种“整体性”——批评文本与灵魂高度之间的互相激发和激活、创设。这实际上也是对批评家自身的生命

力、活力、性情、趣味、兴味的考验。陈超不仅经受了这种近乎残酷和噬心的话语考验,而且还领受到这一过程中的快乐与慰藉。正如他那个感动很多人的诗句,“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忧郁镀亮”。

《诗野游牧》所体现的心态和心境也是深有意味的。在以往的诗学论著《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中国先锋诗论》《游牧者说》《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以及《诗与真新论》中,陈超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特有的沉思、忧患以及担当意识是非常明显的。这实际上正是陈超所说的,在“求真意志”的驱动下对灵感和困境的双重揭示。而到了《诗野游牧》,如此诗意、轻松、舒朗、清逸的言说方式确实给几十年来的诗歌批评话语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空间。

从“游荡”到“游牧”,正如陈超所说,是在寻求一种差异性、局部性、偶然性和“无政府状态”,

像是一场自由、开阔、流荡、丰富、散逸而鲜润的“游牧”。在我看来,这种细微、自然、原生、随性、独到、独立的话语方式是难以被模仿的,因为它只能属于批评家们的少数人。

当然,从“游荡”到“游牧”,其间的转换过程并不轻松。多年来,这两个批评者形象一直在陈超的诗歌研究和写作中同时存在,“游荡”多为痛苦、孤独与沉重,而“游牧”的诗意、宽怀、放松和任性显然更带有理想主义甚至诗学的个体乌托邦的意味。在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往返和跋涉正是陈超多年来诗批评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对于这种“游牧”式的“现代诗话”而言,陈超真正做到了“以小博大”。看似容量紧缩的过程实则展开的是一种开阔和鲜活。这正如茫茫大海上撒网的过程,收放自如,缩进然后散开的过程正对应了“诗话”的本质。也正如陈超所言,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写作,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世界的“思想方法”。换言之,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写作,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世界的“思想方法”。惟有如此,才印证了诗歌批评工作所需要的特殊才能——“诗有别趣”,同时更印证了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之间的特殊关联——相互补充、彼此观照。正如陈超所说的,诗歌和诗学一样往往从反思对方开始。

“诗野游牧”,无论是在现实的雾霾中还是在诗批评的践行中都显得如此可贵、难得,当然也更携带着无法想象的难度。我希望陈超继续骑着白马,在逐水草而居的路上缓缓前行,任意东西。精神的游历和放牧与复杂性的、现代性的精神游荡同等重要。关键所在就是很多人并不具备这种“游牧”的能力。而像陈超这样同时具备诗歌批评的“游荡”和“游牧”精神的人应该算是这个时代批评场域中的一个奇迹了。

■看小说

## 王祥夫《金色琉璃》美与哀愁

王祥夫的短篇小说《金色琉璃》(《芒种》2014年第4期)描述了一个温情而感人的故事。金麦无以排解丧母之痛,更兼“子欲孝,亲不在”的愧疚:身为琉璃工艺师的她一直想亲自给母亲做一个金色的琉璃瓶,却迟迟未曾动手,直到母亲溘然离去。小说笔触真挚细腻,美丽、奇幻而又易碎的“琉璃瓶”如同无处不在的亲情,在“高温”中融化、凝固,盛满温暖、关怀和眷恋。

母亲离世后,金麦睹物思亲,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节奏和重心,就连自己熟悉的家也令她感到陌生。渐渐地,她的行为举止变得有些失常——她不仅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口琉璃瓶(“如果施泡菜,一次能吃半年”),还在网上征集“临时母亲”想要一同过年。小说中两次写到金麦“感觉到自己把眼泪咽回到肚子里去了”。金麦的状态让丈夫夫李无比担忧,甚至打电话询问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这样下去金麦会不会得抑郁症。同时,大小小心翼翼地藏起了厨房墙上挂着一把“用来给鱼开膛”的大剪刀,并且准备答应金麦,让一个陌生老太太来家里一起过年,还准备把那个巨大的琉璃瓶送给老太太,只要她能够解开心结。结果,读过其中一个老太太长信后,李再也没说不出话来;他无法想象那个孤独的老太太“一个人过年,一个人包饺子一个人吃”的情形。新年这天,大李和金麦一道带着琉璃瓶,开车去了老太太家。琉璃瓶用包装纸一层层包裹着,平稳地放在汽车后座上,“你不知道它有多漂亮”。

(刘凤阳)

■评 论

## “艺术生活”呈现文人意象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15日至20日,由《中国水墨》杂志社和竹语间艺术中心主办的“文人意象——艺术生活呈现展”在京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了刘知白、韩羽、吴悦石、杨春华、李学明、董浩、胡石、傅延煦、袁武、王艺、李文亮、刘廷龙、张捷、许宏泉、姚震西、王有刚、韩璐、丘挺、汪为新、金心明、大乐、范治斌、刘静等艺术家的书画和家具作品。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不少艺术家始终坚守与探索着中国文

人精神中的意境,其中文人书画寄情于景,文人家具寄情于物,将自己对生活、自然和生命的认知与感悟寄予笔墨金石之间。主办方表示,文人书画追求自在天然的艺术风格,家具崇尚简约凝练的表现形式,虽然形式各异,但都有着共同的精神情怀与审美意趣。希望此次展览以一系列具有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的作品,表达出文人内心的隐逸之情和清静高远之气,展示其秉物游心、借物抒情的精神诉求。

## 张家口创排口梆子剧《魂系京张》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6月11日,口梆子新编近代剧《魂系京张》创排新闻发布会在张家口市举行。在喜迎京张铁路肇建110周年、京张高铁即将开工之际,由张家口市演艺集团创排的《口梆子剧《魂系京张》以弘扬詹天佑爱国情怀为主题,讲述詹天佑不畏权势、排除万难修建京张铁路的艰辛故事。

发布会上,张家口市演艺集团负责人介绍了创排《魂系京张》的

初衷,编剧郑怀兴介绍了剧本的内容梗概。郑怀兴说:“以前我写的《新亭泪》《傅山进京》等剧本,故事性都比较强。这次写詹天佑修铁路,似乎没有什么情节可言,但随着对史料了解的深入,我被詹天佑的精神所感动,对写好这个故事也有了信心。”据介绍,《魂系京张》目前已完成剧本创作,演职人员将加紧排练,预计于2015年元旦前后与广大观众见面。

## “我的儿子皮卡”陪伴孩子成长

本报讯 近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京举办曹文轩“我的儿子皮卡”系列丛书出版五周年庆典。桂晓风、海飞、贺绍俊、李东华、翌平、安武林、王乐芬等与众多小读者一起分享“我的儿子皮卡”带给读者的感动与启迪,体味那段一段成长岁月的魅力。

“我的儿子皮卡”系列是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首部少年成长系列小说,目前已出版了10册,累计销售140多万册。该系列以幽默诙谐的笔调,讲述了小男孩皮卡的成长故事。皮卡从出生就充满了传奇色彩,为这个世界创造故事。他以一个孩子的清纯目光看待这个世界,一时不能明白这个世界,但初

## 谢云、苏士澍、杨再春书法联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14日,“臻·妙——谢云、苏士澍、杨再春书法联展”在北京雍和美术馆开幕。展览由中国版权协会主办,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承办,共展出了三位书法家的60幅作品。

此次参展的三位作者不仅是书法界造诣颇深的前辈,而且都是由出版界走出来的。谢云自小钻研草篆,其字古拙绚丽,虚实结合,拥有散而不乱、令人难忘的个性;苏士澍兼习诸体,善以鸡毫作篆书、隶书,饶有特色,行书亦流畅含蓄,韵味极浓;杨再春的作品既有魏晋南北朝的神韵,又有明清时代的

雅趣与朴拙。此次联展通过三位书法家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书法的艺术与魅力。

据介绍,为打击书画造假,此次书法展专门使用了中国版权协会艺术品鉴证备案中心的艺术品特征信息备案服务,每一幅书法作品都配有艺术品特征信息备案证书。该中心还为此次参展的所有作品提供保真鉴证服务,并将保真鉴证作品收录到艺术品保真数据库系统中。

展览开幕式当天还举行了座谈会,出版界、文化艺术界有关人士探讨了三位书法家的艺术特色。此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1日,联展同名图书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

## 小百花越剧团迎来“而立之年”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今年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30周年。6月下旬,该团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为首部观众奉献一系列精彩的演出,为自己的“而立之年”庆生。近日,此次演出的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国家大剧院院长助理李志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戏剧导演郭小男及“小百花”的忠实戏迷欢聚一堂,共话因“小百花”而结下的不解情缘。

自1984年成立至今,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绩,不仅创作出《五女拜寿》《琵琶记》《西厢记》《陆游与唐婉》《藏书之家》和新版《梁祝》等优秀作品,还培养了诸多知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入选为39家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之一,深受广大戏迷的喜悦。茅威涛表示,在三十而立的今天,历经市场与生存考验的“小百花”已从困顿

走向从容。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剧种,越剧应在广泛学习戏曲大家族各种精华的同时大胆创新,才能推出为时代和观众所接受的作品。

据介绍,此次“小百花”生日会的北京分会场将于6月24日至29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3部剧目,其中《二泉映月》是新作,《五女拜寿》和新版《梁祝》都是“小百花”颇具艺术水准和影响力的经典佳作。《二泉映月》取材于民间盲人艺术家阿炳的坎坷人生与艺术创作历程,深入挖掘了阿炳的生命特质与音乐灵魂,塑造了一位伟大的民间音乐艺术家形象。该剧由郭小男和罗周共同编创,郭小男执导,“60后”至“90后”四代“小百花”演员参与了演出。《五女拜寿》此次的“重聚版”演出也将汇集董柯娣、徐爱武、茅威涛、陈辉玲、洪瑛、邵雁、颜恕、吴海丽、赵小珍、俞会珍等演员。

## 孙绳武同志逝世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孙绳武同志于2014年6月9日逝世,享年97岁。

孙绳武,笔名孙玮。译著有《卢笛集》《希克梅特诗集》《吉洪诺夫诗集》《巴努斯诗选》《人》《蒙莱托夫传》《普希金传》《托尔斯泰评传》《高尔基传》《谈诗的技巧》和《俄国文学史》(合译)等。

现实比想象更扎实厚重

□季栋梁